

难从海国问红妆

向警予: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及创始人之一,1895年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新民学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二大后,在党中央机关做妇女工作。1928年牺牲,时年33岁。1936年,毛泽东评价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吾辈当求真心,做真事业”

向警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内忧外患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她,少年时就充满求知渴望,关心国家兴亡。1912年秋,17岁的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又转入湖南女校。在此期间,她将原名“向俊贤”改为“向警予”,提醒自己反对封建思想和势力要高度警惕。

向警予早期抱定“教育救国”的理念。她从湖南女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湘潭创办了湘潭女校,并担任校长。她给学生讲述国家大事,宣传爱国主张,号召大家发愤图强,将来为苦难同胞服务。这一时期,向警予的思想

楼兰是历史上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故地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孔雀河东南,是出阳关、入西域的门户,汉唐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称为亚洲腹地的交通枢纽。令人困惑的是,曾经繁盛的楼兰国竟然在公元3—4世纪后悄然消失,有人说是战争的原因,有人说是水涝,有人说是干旱。直到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考察时发现了楼兰古城遗址,轰动一时,成为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楼兰、研究楼兰。

“楼兰”之名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提及楼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这时的楼兰已被匈奴征服。《汉书·西域传上》:“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二十。”“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扞泥城,故址在今新疆若羌县附近。汉昭帝时,中郎将介子曾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对汉朝的态度反复无常,应该诛灭。霍光说:“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楼兰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要,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非打通楼兰不可。到了唐朝,楼兰已湮没数百年,但在边

还未完成熟。她在写给哥嫂的信中提到:“事业一层,不必太求急进。平常人之所视为荣辱得失者,吾辈视之真不值一笑。吾辈当求真心,做真事业……”虽然“真事业”的面目还比较模糊,但她已把自己的事业同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9年,向警予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思想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她与蔡和森、蔡畅等组织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人。在当年12月7日欢送第八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上她演讲道:“吾人之求学,宜抱献身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亦吾人应注意也。”带着“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的初衷,同年底向警予亦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她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几个月后便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1920年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献身革命的情怀:“总要辱你老这块肉与这滴血,而且这块肉这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正是在法国期间,向警予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从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中。

“为我女界呵,大放光明”

向警予很早就有强烈的女权意识。1911年,16岁的向警予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蒋胜眉(丁玲之母)等七名女同学结伴,结伴时有如此誓词:“姊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

在担任湘潭女校校长期间,她编写的校歌有这样的词句:“愿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触目惊心!愿同学作好准备,为我女界呵,大放光明!”动员大家振作精神,为妇

寨战争、丝绸之路的再次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方文化频繁交流的时代背景下,唐人唤醒了古老的记忆,通过诗歌使楼兰复活并注入新的内涵。对唐人而言,楼兰是汉代故地,也是眼前的客观存在,遥远又切近,所以在诗中不时加以实写:“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陈子昂《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神武异常的将军纵横关塞,所向无敌,刚从楼兰国故地返回,又要奔向朔方的边城。“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

唐诗中的楼兰

走”。在诸多书写楼兰的诗中,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为著名,表现了守边将士的果敢悲壮,交代了西域境内的两个轮台:一是汉轮台,故址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一是唐轮台,故址在今新疆昌吉市、米泉区至乌鲁木齐市一带。两个轮台分别在天山南麓和北麓,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轮台环境奇异,霜

多时候,唐人以“楼兰”指代敌人,故

女解放、男女平等,起来革命,为女界争取光明的前途。

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向警予更是走在时代前列新女性的代表。1918年底,驻湘的湘西镇守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上了向警予,派人向她家提亲。向警予不慕封建军阀的权势,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在个人婚姻问题上显示了顽强和独立之精神。她亲自来到周家,当面拒绝了周则范的求婚。后来在赴法旅途中,向警予与蔡和森在共同探讨对改造中国认识的过程中,确定了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也确定了志同道合的伴侣。她的婚姻是完全新式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她曾在信中告诉父母:“和森是九儿(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

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积极投身到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党的二大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创立妇女部,开展妇女运动。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明确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思想。在此期间,她起草了妇女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和决议,并亲自担任《妇女周报》的主编,在《妇女周报》以及《向导》《前锋》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干部。向警予还直接领导了上海丝厂女工联合大罢工和上海南洋烟厂工人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局面,使女工们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9年三八妇女节时,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为妇女解放、为

方,是征战讨伐的对象,以“斩楼兰”“刺楼兰”“破楼兰”“取楼兰”“指楼兰”等表达杀敌立功、保家卫国的理想。“斩楼兰”也称“刺楼兰”,典出《汉书·西域传上》。被匈奴役使的楼兰屡次劫掠汉使,阻碍西行,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大将军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资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贵人左右皆散

走”。在诸多书写楼兰的诗中,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为著名,表现了守边将士的果敢悲壮,交代了西域境内的两个轮台:一是汉轮台,故址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一是唐轮台,故址在今新疆昌吉市、米泉区至乌鲁木齐市一带。两个轮台分别在天山南麓和北麓,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轮台环境奇异,霜

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慨慨慨”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被捕。向警予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在狱中,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也不能从她口中得到党的任何机密。她坚定地表示:“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无上光荣!”由于向警予是工人们敬爱的领袖,在群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反动派专门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杀害向警予,以达到“以儆效尤”之目的。在去刑场的路上,她向人们高唱《国际歌》并呼喊口号,敌人慌忙向她嘴里塞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腕。

1928年5月1日,向警予被杀害于余记里空坪刑场。就义前她曾留下这样的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慨慨慨。”

诗人柳亚子以沉痛的心情,写下诗句寄托哀思:“雄词慷慨湘江向,倩语缠绵浙水杨。长痛汉皇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蔡和森听闻噩耗,悲痛不已,撰文悼念:“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怀抱坚定的信仰,并用激越的精神去践行,至死不渝,这是向警予的真实写照。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造真学问求真能力,这不是对国家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吗?”“我为这惟一光明惟一希望而不孝不友之事竟躬犯之,如无所建白,打心何以自安。”为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惟一光明惟一希望”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是向警予铭刻进生命的誓言,她也是这么做的。 □何羽

人物春秋

黏泉眼,风透犀甲,远山似来,战鼓如雷。“不斩楼兰不拟回”与“不破楼兰终不还”一脉相承,体现的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情怀。

唐人的楼兰记忆是伴随着唐王朝的强大而鲜明起来的。“摧枯逾复城,拓地远三千。骨都魂已散,楼兰自复传。”(虞羽客《结客少年场行》)骨都,匈奴有左右骨都侯。首复安,指唐人崇拜英雄,歌颂战功,渴望能像汉王朝一样开疆拓土,清扫边塞,成就彪炳千秋的伟业,所以就有了“斩楼兰”“刺楼兰”的书写。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口一词中,玄宗朝宰相张九龄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日文兼武,而今粟且宽。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送赵都护赴安西》)文武兼具,坚实宽柔,边境自会平安,又哪用刺杀楼兰王呢?

无论何种原因,楼兰的湮没都是一首凄婉的历史悲歌。幸运的是,唐人通过深长的记忆和持续的书写,将古老的楼兰复活并转化为内蕴丰富的地理符号、文化符号,其中寄寓了边防安全、国家强大的渴望,也引发读者关于历史、民族、异域、远方以及理想、功名的无穷想象和思考。历史上的楼兰虽然被时间尘封,但唐诗中的楼兰却鲜活依旧,因为唐人已将楼兰镌刻在了记忆深处。 □高建新

成了后来的“禁火节”。

《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说:“以本铎修火,禁于国中。”

春秋时期,因民间有纪念介子推的传说,才将古老的“禁火节”与介子推联系起来,将“禁火节”改为“寒食节”。汉时,山西介休绵山被誉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每年寒食节举行隆重的祭祀介子推的仪式活动。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下令取消这个习俗,《阴罚令》中有言,“闻太原、上党、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子推”,“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三国归晋后,纪念介子推的禁火寒食习俗才得以恢复,时间压缩为3天。唐宋时期改为清明节的前一天。到了明清时,寒食节便和清明节合为一体,寒食节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在《燕京岁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但儿童戴柳,祭扫坟墓而已。”

古代先民,因心怀对先贤介子推的敬重之意,而对寒食节禁烟冷食非常重视。寒食文化中蕴含的忠孝核心以及由忠孝延伸出的诚信、廉洁等,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是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力。尽管寒食节已并入清明节中,但其许多习俗,如禁火、寒食、扫墓、戴柳等被清明节继承,成为这一节日的重要活动内容。寒食文化与清明文化相融相合,又逐渐发展为缅怀革命先烈、教育青少年的重要形式。 □王杰

钩沉

语林指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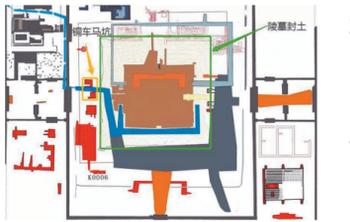
周梅森的长篇小说《国家公诉》,是反腐倡廉题材的。小说中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女检察长叶子菁正气浩然,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只是在分析大富豪娱乐城火灾案情时不止一次用了“一推二六五”这个词语。如:

叶子菁一怔,提醒道:“……现在看来,这个案子可能会比较复杂,如果大家知道苏福福已经死了,涉嫌受贿渎职的问题很可能查不下去,有些人就要一推二六五了!”

“一推二六五”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按其文意,是那些涉嫌受贿渎职者的推卸责任。如果此推测不错,那“一推二六五”显然是“一推六二五”的意思,只是将“六二五”错作“二六五”。“一推六二五”本作“一退六二五”,原是一句珠算斤两法的口诀,一除十六是0.0625,“推”是“退”的谐音,故而成了熟语,借用将责任推卸干净的意思。或问,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基本上都是十进制位置,是十的整数,而作为衡的基本单位,两到斤为何不是十进制(请注意,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而是十六进制。这就要从秤的制定原则说起。《汉书·律历志》:“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方之相也。”也就是说,十六两为一斤,是按四时春夏秋冬四方东西南北的原则确定的。于是有秤。

秤是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秤杆的十六个星为一斤,十六个星依何来?《汉书》中说:“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平也),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日、月、五星),说是权衡物的轻重,就要公平,并以玉衡星作喻。玉衡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星,旋机是古代观测天文的仪器。所以“衡”就是准星。据说造秤时,取象于天上之星,以为敬畏之意。哪十六星?即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外加福禄寿三星。卖东西时如果用秤坑人,那就是伤天害理,为人不容。少称一两,折福;少称二两,折禄;少称三两,那就折寿。上古造秤的先贤,真是摸透了人们的心理,定了交易的标。

纪晓岚《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三,有“小秤铭”,铭曰:“老聃折衡,使民不爭。然不能使物无轻重,终不如秤之以平。”道教的始祖李耳主张无为而治,他曾折秤杆,使民不爭,而不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生活。然而秤还是要用,它的作用就在于公平。由此而产生的词,有争衡,衡量等,由此而产生的成语,有半斤八两,斤斤计较。半斤八两,比喻彼此一样,不相上下(多含贬意),斤斤计较,形容过分计较微小的利益或无关紧要的事情。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由于阴差阳错,有刘、孙、裴三家涉婚成讼,经乔太守周旋,而点鸳鸯谱成就了三桩婚姻,乔太守判词有云:“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生不日,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晰,各赴良期。”借斤两作判词。新人耳目。“十六两原只一斤”,其语质朴,其意劲峭。 □杨乾坤



铜车马为何在秦陵地宫旁

车马在古代社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上层人士日常乘用的交通工具,同时还是人的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更是礼制的组成部分。

所以,从商代起车马已成为社会上层人士死后的重要陪葬品。到了周代,车马陪葬与“鼎簋(guì)制度”一样,成为埋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贵贱,辨等列”的作用,因此,周人从丧葬礼制的层面对随葬车马做出了规制约束。《礼记·檀弓下》中明确指出,对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死后陪葬车马数量有严格的规定。秦陵彩绘铜车马作为秦始皇陪葬的车马埋藏在地宫旁边,是上述丧葬思想和随葬制度的体现。

马车的制作非常复杂,对技术要求极高。《周礼·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而马的饲养则需要耗费很多的财力和人力。因此,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即便是身份显赫的贵族,用实用马车和真马陪葬也是相当奢侈的做法。春秋时期,礼制崩乱,埋葬奢靡风气盛行。实力雄厚的诸侯王和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竞相冲破传统等级制度的束缚,纷纷在墓旁陪葬数量众多的车马。在其影响下,社会中下层也都在跟风仿效。有些财力不济的贵族无力承担以实车真马作陪葬的耗费,为了满足葬礼的虚荣,便想出了用专门制作的车马模型代替实用车马陪葬的新方式。由此,在春秋晚期便出现用明器车马陪葬的变革。战国时期,虽然沿袭周车马坑陪葬的传统,真车真马陪葬习俗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以明器车马为代替的随葬形式已然成为一种潮流,并被社会上层接受。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车马,应当是适应战国时期车马随葬明器化变革潮流的产物。

秦陵铜车马虽是明器化的模型车,但它们完全按照真车制作,其随葬陵园的礼制属性,与殷周以来的真车真马陪葬完全相同。若按制作铜车马耗费的人力、财力、铸造和加工的难度及装饰的豪华性来说,用这样高贵的明器车马陪葬,甚至比用真车马更能显示墓主身份的尊贵。同时,大量的考古信息说明,为墓主陪葬的车马坑总是设在距宫室较远的地方,以明器车马随葬形式来体现。埋藏铜车马的秦始皇陵车马坑位于陵墓封土西侧20米处,居于通向地宫的墓道外侧,无疑应是皇帝车库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铜车马,是供奉秦始皇帝灵魂乘坐的鸾驾乘舆中的两辆。 □秦秦

“清明节”的由来

清明节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这一日是怀念、祭奠、铭记、感恩的日子。它还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同时为节气和节日的传统民俗节日。

“清明节”与天气物候的变化有关系。《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这里春分后的十五日,传统意义上是指冬至过后的第108天,即发生于仲春与暮春相交之际的一段时间。

古时将“清明节”称为“三月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三月节……物至此,皆以洁齐而清明矣。”这里的三月指的是夏历的三月,因此得名“三月节”。

《历书》有言:“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清明”与“洁齐”互为形容词,“洁齐”谓万物因温湿润泽而生长,“清明”指气候清静而明媚。每每到清明之际,冰雪消融,万物复苏,草木青青,莺飞草长,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作为时序标记的清明,在汉代就已经有了明确记载,可是,作为一种节日,直到唐宋以后才形成。原本清明仅仅是为农事所设置的节气之一,本来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直到后来,清明逐渐演变成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这一变化与另外两个古老的节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上巳节和寒食节。

上巳节:三月三日天气新

古时,上巳节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这一日人们临



河洗浴,祛邪求吉,野外踏青,自由春游,反映了人们在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困顿后迫切希望调整萎靡的精神,焕发朝气的心情。

晋代陆机有诗云:“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即是当时人们在上巳节被祓、踏青的生动写照。

先秦时代,以沐浴消除邪气的风俗便已盛行;周朝时,每逢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上巳日)用香薰的草药沐浴,进行“被除衅浴”之礼已演化成一种制度。汉代便将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定为节日,谓之“上巳节”。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这一日,皇帝在曲江边宴请群臣,百姓也会到水边进行郊游,这一时期原本繁杂的“被禊”被简化为“洗手脚”,还形成了新的趣俗——曲水流觞。王羲之《兰亭序》即是这一情景的生动再现。到了唐朝,上巳节已经发展为重要的节日之一,“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由唐朝自由绚丽的文学加以歌颂,这一节日焕发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

宋朝后期,理学盛行,礼教渐趋森严,除重要节日外,朝廷不再鼓励举办春游、祓禊等仪式,三月上巳节逐渐衰微,只在民间流传且不再是全国性习俗。